

# “四史”学习中的历史虚无主义批判

张国义 郭 斌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上海 201620)

**【摘要】**历史虚无主义随着近代西学东渐的风潮来到中国,其理论基础为“西方中心论”,其论述主线是“全盘西化”。历史虚无论者运用新历史主义和建构主义等方法,妄图解构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宣扬“客观”主义史学,妄图重评“四史”;以“现代化范式”取代“革命史范式”,妄图重构“四史”。在“四史”研究和学习中,我们应坚持历史的客观性原则,在“求真实”的基础上“求信仰”;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和唯物辩证法,把握“四史”的主题主线、主流本质;基于正确的政治立场,运用多元的观察视角,丰富“四史”的历史论述,增强反击历史虚无主义的力度和实效。

**【关键词】**“四史” 历史虚无主义 历史虚无主义批判

**【中图分类号】**D2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192X(2021)06-0038-06

DOI:10.16075/j.cnki.cn31-1220/g4.2021.06.006

学习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以下简称“四史”)有利于我们更好地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精髓,深化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科学认识。但科学认识是一个“不破不立”的过程,2021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指出,要旗帜鲜明地反对历史虚无主义,加强思想引导和理论辨析,更好正本清源、固本培元。<sup>[1]</sup>在“四史”学习中如欲达到科学认识,特别是在党史学习中达到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的目标,就必须批驳形形色色的历史虚无主义观点。破除历史虚无主义是“四史”学习中的一项重要任务,也是达到“四史”学习教育目的的重要手段。

## 一、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流变

历史虚无主义是对客观历史的真相、本质、规律持怀疑、否定和消解的态度,对历史事件和人物

任意解释甚至刻意歪曲的一种历史观。虚无主义思潮出现在19世纪20世纪之交,随着资本主义危机的爆发,西方思想界开始出现怀疑资本主义曾经确立的“理性”观念,转而颂扬“非理性”在历史发展中作用的思潮。尼采将这种以否定历史传统和道德原则为特点的现象统称为虚无主义。<sup>[2]</sup>近代以来,历史虚无主义思潮随着西学东渐传入中国,一些知识分子将近代中国积贫积弱的状况归咎于中国历史与文化,认同西方,把中国悠久的历史与传统文化视为走向现代化的包袱,“尊西崇新”渐成风尚,在历史学界出现“疑古学派”,在思想界出现西化思潮,激进者呼吁中国应“全盘西化”。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全盘西化”论者陈序经认为中华文化“样样都不如人”,“中国之趋于全盘西化,不过是时间的长短问题,我们若不自己赶紧去全盘西化,则必为外人所胁迫而全盘西化”。<sup>[3]</sup>自由主义者胡适认为中华文化的出路在于“努力全盘接受这个新世界的文明”。虽然胡适认为“全盘西化”只

是一个手段，最终会因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惰性”而得到一个调和折中的中国本位新文化，但当务之急还是“全盘西化”。<sup>[4]</sup>此时的“西化派”以是否有利于推动他们认知中的中国现代化或者说“西化”为标准界定文化的优劣，从而否定中国的历史和文化，所以中国近代以来历史虚无主义往往与文化虚无主义相伴生。

新中国建立后，由于国际上资本主义国家与社会主义国家两大阵营的尖锐对立和国内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宣传教育，以“全盘西化”为指向的历史虚无主义自然没有容身之地。改革开放后，西方各种思想不断涌入，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泛滥起来，20世纪80年代中期，在思想文化领域出现了“民族虚无主义”，歪曲中华民族历史、否定中华民族优良传统。此类民族虚无主义思潮鼓吹“全盘西化”，认为走资本主义道路才是中国的唯一出路，不仅彻底虚无中国历史文化，还虚化了近代以来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斗争史，虚化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史和社会主义建设史。“全盘西化”论不但彻底割裂中华民族的历史进程，否定历史连续性的本质特征，而且与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功历史经验相背离。这股思潮确实产生了相当大的消极影响，从思想文化界波及党内。1989年12月，江泽民在一次讲话中指出：“一个时期以来，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泛滥，资产阶级的‘民主’、‘自由’、‘人权’口号的蛊惑，利己主义、拜金主义、民族虚无主义和历史虚无主义的滋长，严重侵蚀党的肌体，把党内一些人的思想搞得相当混乱。”<sup>[5]</sup>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物质主义也不断蔓延，弱化了社会主义价值和传统文化价值，为历史虚无主义的泛滥提供了土壤。特别是在文化教育领域，历史素材被纳入娱乐化和产业化，其后果如有论者所批评的：“在‘戏说’、‘水煮’、‘笑谈’等表达方式中，历史失去了它应有的凝重与庄严，蜕变成一堆美丽的垃圾。”<sup>[6]</sup>历史虚无论者对历史素材进行市场化的开发，模糊文艺娱乐与历史研究的界限，文化娱乐成为历史虚无主义的重要载体和传播渠道。

而在历史研究方面，后现代主义史学思潮则为

历史虚无主义提供了某些理论支持，特别是新历史主义和相对主义等史学理论方法在史学研究中的滥用。所谓新历史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史学中的历史主义有本质不同，马克思主义史学更加强调历史主义与阶级观点相统一，而新历史主义则更关注历史的多元性和独特性，往往质疑历史的普遍规律，强调历史的偶然性和不确定性，倾向于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在具体史学研究方面，关注历史细节而贬抑历史的宏大叙事，忽略历史的主题主线、主流本质，在中国近现代史研究方面，以“现代化范式”取代“革命史范式”，将革命与现代化对立，认为革命是对现代化的破坏，“救亡压倒启蒙”，其典型观点为“告别革命”，妄图从根本上颠覆关于中国近现代史以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为主线的论述。

此外，苏东剧变等国际共运的挫折一定程度上助长了西方对华“和平演变”势力的思想渗透，他们竭力证明社会主义制度之不可持续，西方资本主义制度和价值观之“普世性”。历史虚无主义根本否定近代以来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历史必然性与合理性，为西方“和平演变”和“颜色革命”提供理论依据和舆论准备。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虚无主义并非孤立的社会思潮和学术论争，它为宣扬西方宪政民主、“普世价值”、新自由主义、民主社会主义等错误思潮提供历史依据。在话语体系“西强我弱”的现实情况下，历史虚无主义在历史研究、文化教育、文艺娱乐等各领域泛滥成灾。

## 二、历史虚无主义虚无“四史”的方法与主要观点

历史虚无主义思潮本质上是基于唯心史观的政治思潮，其核心政治价值是“西方道路才是人间正道”。<sup>[7]</sup>其出发点或落脚点在于将西方价值作为“普世价值”，以西方资本主义道路为“人间正道”。由此妄图对“四史”特别是党史和新中国史进行解构、重评和重构。其思想方法和基本观点大体如下：

1. 运用新历史主义和建构主义方法，妄图解构“四史”

新历史主义和建构主义主张历史叙述带有强烈

的主观性，历史事实只是认识主体主观构建的产物，强调历史的相对性，认为历史研究者的认知无法达到历史真相，但为了保证历史编撰的连贯性，可以对历史进行某些推测和虚构，夸大个人的主观能动性和历史偶然性，从而企图解构主流“四史”论述、虚无“四史”正名。基于此，历史虚无论者善用假设，以所谓普遍的人性取代阶级分析，以臆想推测的方式解构“四史”。

历史虚无论者往往夸大历史偶然性，否定历史的必然性和客观性，认为历史主体的主观因素及一些偶发因素在历史进程中起到决定作用。历史虚无论者认为中国人民选择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共产党、社会主义道路和改革开放并非历史必然，而是各种偶然性因素造成的。如历史虚无论者认为马克思主义传播和中国共产党成立是苏俄推动的结果，苏俄在其中起到了决定作用；还认为抗战胜利后国共两党未能建立联合政府等具有偶然性，而此类偶然因素或事件决定了历史的走势。

对历史虚无论者来说，历史进程无必然性和规律性可言，理应可以对历史进行一些所谓“合理”的假设，以推演历史可能的发展方向。如有人认为“西方殖民有功”、“侵略有功”，如果任由西方殖民中国早就实现现代化了，从根本上否定了中国人民的反侵略斗争和中国革命史、中共党史。其他如假设戊戌变法成功、未发生辛亥革命、新文化运动中未发生五四运动、抗战胜利后未发生国共内战、新中国成立后未发动抗美援朝、不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等，其结论为“救亡压倒启蒙”、“告别革命”、“选择社会主义道路是走错了路”、发动抗美援朝运动得不偿失、社会主义改造不必要等，从而臆想出如果中国人民放弃抵抗西方侵略成为西方殖民地、不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放弃抵抗美国侵略、不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中国可能出现的历史图景。

历史虚无论者排斥阶级分析方法，强调普遍人性和个人的性格、意志甚至心理状态在历史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他们忽略历史人物的阶级性，不重视从历史人物的阶级立场分析他们的言行事功，又否定阶级斗争贯穿阶级社会、推动社会发展。强调普遍人性和历史人物的主观因素在历史进程中的作用

背离了历史发展的必然性和规律性，也与历史事实相去甚远，但却能契合普罗大众走近历史和历史人物的“同情”、“同理”之心，易于被广大受众接受，因而贻害无穷。而否定阶级斗争则成为“告别革命”的重要理论依据，按照唯物史观，革命是阶级斗争的产物，既然否定阶级斗争，那么革命就不必要，因而否定革命、颂扬改良是历史虚无论者的一个重要观点。历史虚无论者正是通过上述方法将有关“四史”的理论基础和主流观点进行“解构”。此外，打着客观中立的旗号对历史进行“重新评价”是历史虚无主义的另一重要方法。

## 2. 宣扬“客观”主义史学，妄图重评“四史”

相比于前述之新历史主义和建构主义为思想方法的历史虚无论者，以“客观中立”面目示人的历史虚无主义则更有迷惑性。中国传统史学中即有乾嘉学派在清初文字狱的环境下排斥历史认识主体的主观品评，专注于史料辨伪考据。近代以降，以德国兰克史学为代表的客观主义史学传入中国且影响极大，中国学界也在史学科学化思潮的影响下出现了所谓史料学派，提出“一分材料出一分货，十分材料出十分货，没有材料便不出货”，<sup>[8]</sup>宣称“史学就是史料学”。改革开放后，学界对此前“以论带史”的学风进行纠偏反思，倾向于回避宏大叙述，转向“以小见大”的历史小叙事，历史研究趋向碎片化。而历史虚无论者则借势提出历史研究应立足史料，“去政治化”、“价值中立”、“还原历史”。他们声称中国近现代史、党史、革命史、新中国史回避了某些不符合当前意识形态的“历史事实”，因而需要“重新评价”。

但历史虚无论者所标榜的“客观”存在两个问题：一是强调历史叙述和评价立足史料，但在史料选取上采取“为我所用”的态度，抓住一点，不及其余，其指向就是否定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选择和中国人民的选择，如关于“西路军”的评价、抗战时期国民党军队的作用、“反右”扩大化等，还有关于蒋介石、汪精卫等历史人物的评价往往也是借片段或部分史料进行“重新评价”而否定马克思主义史学论述。二是其宣扬的“价值中立”亦不可能。正如有论者认为：“历史虚无主义并不是对历史完

全虚无，而是有所虚无，有所不虚。”<sup>[9]</sup>尤其是对有关“四史”的历史叙述进行有选择地虚无，对凡是能支撑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史实进行质疑、否定，而对在马克思主义史学论述中被否定的人和事重新评价。比如，将新中国史简化为“反右”扩大化、“大跃进”、“文革”等“左”的政治运动史，并选择性忽视新中国在各方面的建设成就；赞美民国，反讽新中国，对民国时期进行浪漫描述和温情缅怀，以此论证建立新中国是历史的倒退；等等。<sup>[10]</sup>

### 3. 以“现代化范式”取代“革命史范式”，妄图重构“四史”

马克思主义史学关于中国近代历史的叙述主要遵循“革命史范式”，认为反帝反封建是中国近代史的主线，赢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是中国实现现代化的前提条件。改革开放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现代化努力成为时代的潮流，而历史则是现实与过去之间的不断对话，历史叙述不能不带有当下的意识，史学界开始借用现代化理论探究近代史，从而推动了“现代化范式”的近代史叙述，并出现了有关近代史研究是用“革命史范式”还是“现代化范式”的分歧和争论。尽管这一分歧只是有关近代历史，似乎只与党史和革命史相关，但却是对历史解释框架的整体颠覆，大至中国近代社会性质、历史主线、道路选择，小至历史人物评价都完全不同，对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和社会主义发展史的历史叙述的影响也是根本性的。

“现代化范式”下的中国近代史就是一部中国追求现代化的历史，一切历史事件和人物的评价都是以是否有利于现代化为标准。“现代化范式”滥觞于20世纪30年代蒋廷黻所著的《中国近代史》，该书提出：“近百年的中华民族根本只有一个问题，那就是：中国能近代化吗？能赶上西洋人吗？能利用科学和机械吗？能废除我们家族和家乡观念而组织一个近代的民族国家吗？能的话，我们民族的前途是光明的；不能的话，我们这个民族是没有前途的。”<sup>[11]</sup>由此得出结论，放弃抵抗，甘心认输，一心一意学西方，就能实现中国的现代化。尽管“现代化范式”为中国近代史叙述提供了多元的视角，可

以看到历史的多面向，很大程度上丰富了“革命史范式”下的中国近代史论述，但历史虚无论者却借此重构中国近代史的历史叙述。正如有论者所说，在“现代化范式”下，“近代中国的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不见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不见了，皇帝和官僚不见了，打倒列强不见了，革命也告别了，让慈禧太后去搞她的现代化，让慈禧太后、李鸿章去走向共和，什么旧民主主义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都可以变得子虚乌有了”。<sup>[12]</sup>

其中尤以“告别革命”最为典型。“告别革命”论者认为“中国在20世纪选择革命的方式，是令人叹息的百年疯狂与幼稚”，表示“我们决心‘告别革命’，既告别来自‘左’的革命，也告别来自‘右’的革命”。还有论者提出“鸦片战争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近代文明”。<sup>[13]</sup>由此近代史主线不再是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追求民族独立、国家富强的进程，而是由西方列强强迫中国与西方接轨的过程，中国人民的反抗是徒劳的、逆历史潮流而动的，革命是破坏现代化的消极力量，自然就否定了中国革命和建立新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正当性。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说成是“只起破坏作用”，认为党史和新中国史是“一系列错误的延续”，认为改革开放只有“全盘西化”才是正途，而苏联解体意味着社会主义的全面失败和资本主义的彻底胜利，从而妄图重构“四史”的历史论述。在历史虚无主义的论述里，中国近现代史成为历史偶然性和错误累积的“意外”，由历史虚无论者虚拟的历史似乎成了“正史”。

## 三、“四史”学习中反击历史虚无主义的方法

“四史”的根基是唯物史观，而历史虚无主义的本质则是唯心史观，所以在“四史”学习中唯物史观是反击虚无主义的利器。坚持历史的客观性原则，积极利用历史研究中的最新成果，在“求真”的基础上求真理、求信仰；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方法，把握历史的主题主线、主流本质；基于正确的政治立场，在“革命史范式”基础上，运

用多元的观察视角,丰富“四史”的历史论述,从而增强反击历史虚无主义的力度和实效。

1. 坚持历史的客观性原则,在“求真”的基础上“求信仰”

历史虚无主义以新历史主义、相对主义和建构主义的方法解构“四史”,其致命缺陷在于忽视了历史的客观性,强调历史的偶然性因素,以历史“后见之明”的眼光去假设历史发展的可能;或以“客观中立”的面目出现,截取片段史料进行歪曲解读。如关于民国史,“少数人挑战历史常识,刻意将饱受列强欺凌、军阀混战、民不聊生的民国时期,说成是‘充满人情味’的‘温柔之乡’,以至于使一些无知的青年相信那是近代中国一段‘最好的时光’,‘心向往之’。这不是‘重新发现历史’,而是随意编造过去”。<sup>[14]</sup>对此,我们应以唯物史观为指导,坚持历史的客观性原则,从“求真”出发去求得真理和信仰,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研究历史应“让历史说话,用史实发言”。<sup>[15]</sup>将历史事实完整地呈现出来是反击历史虚无主义的有力武器。

“四史”的历史学特性即历史的客观性是将学习“四史”作为学习党的创新理论重要途径的主要原因之一。只有坚持历史的客观性原则才能发挥其政治功能。我国传统史学历来有“经世致用”的传统,强调发挥史学的资鉴功用。典型如《资治通鉴》,除正史外,还参考数百种杂史,校勘比对,“其精其博,皆在于求史之真”,<sup>[16]</sup>从而使《资治通鉴》成为史学致用的典范之作。鉴往知来,只有将“四史”的历史论述建立在历史客观性的基础之上,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其政治功能,从而在“求真”的基础上“求信仰”。当然,历史虚无主义常以部分或片段史实立论,有一定的迷惑性。但正如列宁所说:“在社会现象领域,没有哪种方法比胡乱抽出一些个别事实和玩弄实例更普遍、更站不住脚的了。”<sup>[17]</sup>对于历史虚无论者的这种常用手法,我们应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和唯物辩证法,从一个相对长的历史时段,以普遍联系的观点从整体上把握“四史”的主题主线、主流本质。

2. 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和唯物辩证法,把握“四

史”的主题主线、主流本质

近代以来历史虚无论者往往有两个立足点:一是如钱穆所批评的“浅薄狂妄的进化观”,这种观点认为“现在我们站在已往历史最高之顶点”,对本民族的历史文化“抱一种偏激的虚无主义”,“即视本国已往历史为无一点有价值,亦无一处足以使彼满意”;<sup>[18]</sup>另一个就是“西方中心论”,认为中国万事不如人,并归咎于中国的历史与文化。这两个立足点有相通之处,因为这“历史最高之顶点”往往被视为“西化”的成果。所以,归结起来,历史虚无主义立论的基础还是“西方中心论”,那么以此重构的中国近现代史就是以“西化”为主线的现代化史,而“四史”则成了历史虚无主义论述中阻碍“全盘西化”、抗拒历史潮流的“罪史”。<sup>[19]</sup>对此,我们必须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和唯物辩证法,分析近代以来不同历史时期的主要社会矛盾和主要历史任务,明确“四史”的主题主线、主流本质。

按照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历史叙述,近代中国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背景下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斗争史,革命是近代中国的主旋律,其他诸如实业救国、教育救国、学术救国都是近代中国历史进程中的支流,难以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更遑论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只有先争取民族独立,才能谈得上现代化的政治、经济、文化建设。有论者认为:“近代中国的时代基调是革命,中国近代史上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思想、社会变迁,以及中外关系的处理,区域发展,少数民族问题,阶级斗争的状况,无不或多或少与革命的进程相联系。”<sup>[20]</sup>而且历史呈现出的也是以革命的方式追求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并为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富裕创造了最重要的前提条件。依照历史逻辑和理论逻辑,“四史”论述正是建基于革命史论述,“四史”的主线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历史,是追求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奋斗史,是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探索史。真正把握了中国近现代史和“四史”的主题主线、主流本质,历史虚无主义观点也就难有立锥之地。

3. 基于正确的政治立场,运用多元的观察视

角,丰富“四史”的历史论述

“四史”学习应有鲜明的政治立场,“四史”论述是唯物史观指导下的历史论述。唯物史观认为,在历史研究中绝对的“客观”和“中立”是不可能存在的。因为历史研究者处在现实的社会关系网络中,认知能力各有差异,价值观、历史观也未尽相同,这就直接影响了他们对史料的抉择去取和阐释,因而在面对同样的史料时,不同的研究者可能会得出不同的、甚至截然相反的结论,也就是说历史学终究是“解释之学”,而且是基于不同阶级立场、政治立场的“解释之学”。我们学习的“四史”是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指导之下的“四史”,是基于中国共产党人政治立场的“四史”,而不是历史虚无论者在唯心史观指导下重构的“四史”。历史虚无主义论述不管是以“客观”史学还是以倡导历史偶然性的历史选择论的面目出现,其政治趋向都是走向“改旗易帜的邪路”。所以我们在“四史”学习中必须站在中国共产党人的政治立场上,这是我们学习“四史”的基本前提。

我们应当看到,主要由“革命史范式”观照的“四史”论述凝结了几代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智慧,无疑抓住了近代以来中国历史进程的主题主线、主流本质,但也难免带有公式化、简单化的特征。随着史学研究的深化,一些学者从现代化史、社会经济史、思想文化史的视角对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进行了深入系统的研究,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这无疑为我们研究和学习“四史”提供了更为多元的视角,也丰富了“四史”论述。只要我们坚持以唯物史观为指导,坚持正确的政治立场,就可以积极地汲取学界的最新研究成果,最大限度地加强“四史”论述的学理性,做到学术性与政治性的统一,为反击历史虚无主义提供更充沛、更有说服力的学术资源和学理支撑,为进一步推进和深化“四史”宣传教育提供助力。

#### 参考文献:

[1] 习近平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强调:

学党史悟思想办实事开新局 以优异成绩迎接建党一百周年[N].人民日报,2021-02-21.

[2] 刘书林.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表现及其思维方法[J].思想理论教育,2014(11).

[3] 陈序经学术论著[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291.

[4] 编辑后记[J].独立评论,142号,1935-03-17.

[5] 江泽民文选,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94.

[6] 俞吾金.自觉的当代意识是理解历史的钥匙[N].文汇报,2014-05-06.

[7][10] 杨军,梅荣政.历史虚无主义批判:理论和方法[J].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15(1).

[8] 傅斯年.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A].见:欧阳哲生.大家国学·傅斯年卷[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9:46.

[9] 龚书铎.历史虚无主义二题[J].高校理论战线,2005(5).

[11] 蒋廷黻.中国近代史[M].长沙:岳麓书社,1987:11.

[12][20] 张海鹏.20世纪中国近代史学科体系问题的探索[J].近代史研究,2005(1).

[13] 郑炎.打破束缚,更新观念[J].学术研究,1994(4).

[14] 郑师渠.当下历史虚无主义之我见[J].历史研究,2015(3).

[15]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五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让历史说话用史实发言 深入开展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研究[N].人民日报,2015-08-01.

[16] 刘家合.史学的求真与致用问题[J].学术月刊,1997(1).

[17] 列宁全集,第2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364.

[18] 钱穆.国史大纲(上)[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1.

[19] 姜迎春.论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成因、表现及其危害[J].南京政治学院学报,2014(5).